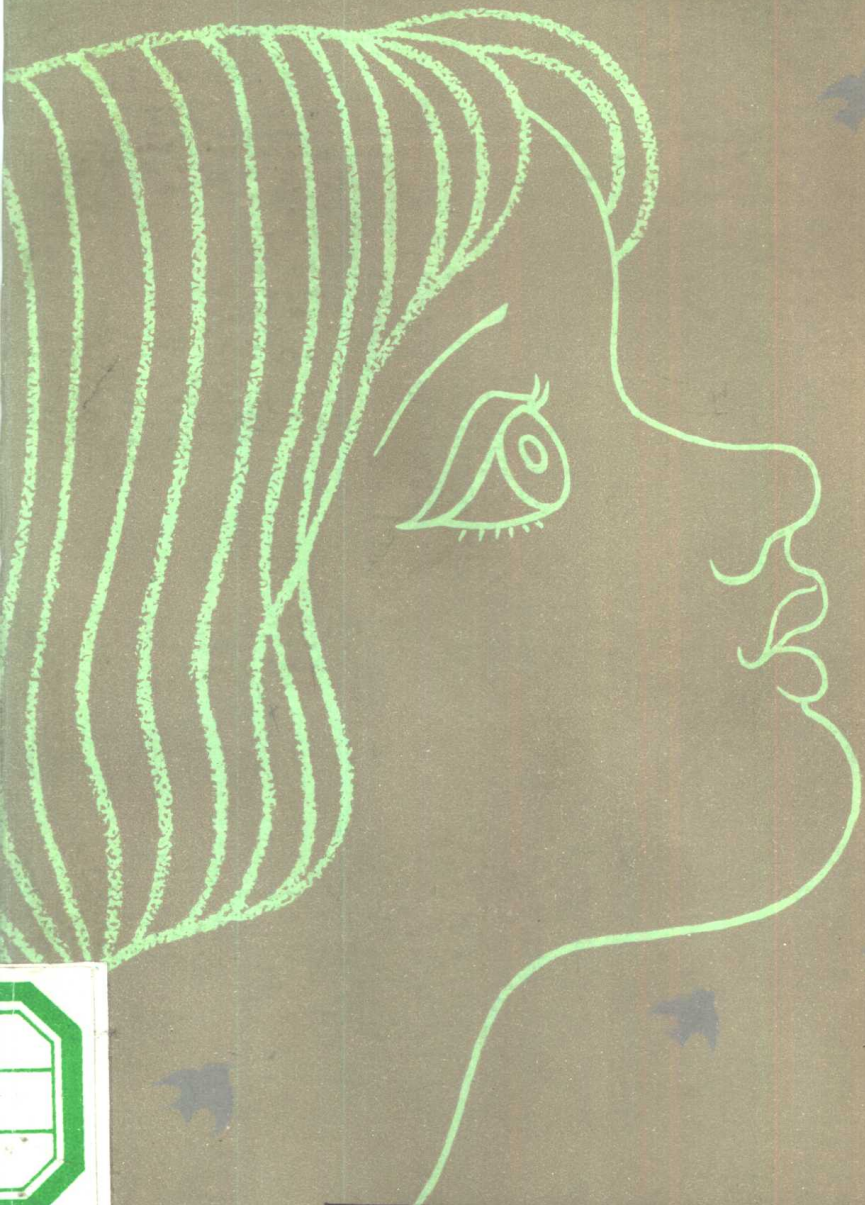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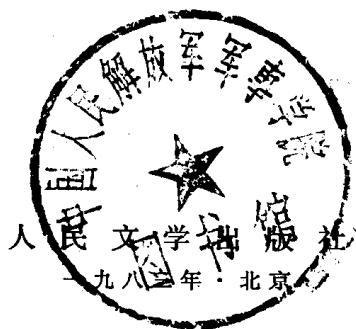
别了，蒺藜

汪浙成 温小钰



别了，蒺藜

汪浙成 温小钰



封面设计：徐中益

别了，蓓蓓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9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frac{5}{16}$ 插页 2

198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46,500

书号 10019·3577

定价 1.15 元

我所了解的他们

朱 寨

汪浙成、温小钰同志应出版社编辑部之约，准备编选出版这个集子的时候，就写信来，要我替他们写一篇序言。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使我感到惶恐。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会给别人写序，有人会让我写序，以为给别人写序是权威或前辈的事情。所以我当即回信，除了感谢他们大概企图给予我一次荣誉的盛情，还诚恳建议另请合适的人写，或者自己谈谈创作经历和其中甘苦心得，恐怕才是读者所欢迎的。他们坚持原意，并非出于我所惶恐的考虑，确实出于另一番诚意。从未尽的言词中，我已意会到其间的一线灵犀。

虽然我与两位作者并无远交，不过从一块工作的吕微芬同志那里常听到他们的名字。她常谈起五十年代北大中文系那段难忘的大学生生活。在她经常提到的同学名字中就有他俩。令人特别感兴味的是，她称呼她的女友温小钰是“这小子”。“那时候我们住一个寝室，生活上全靠着我，连她的手巾、袜子都得我替她经管。‘这小子’生活一塌糊涂，对人却非常热情，头脑极灵。”谈起当时她们的精神状态，也常举温小钰的例子。“小钰你要记住：当你自己感觉轻松

舒服的时候,说明你已经右倾了。”对这位政治老师的告诫,她不但视为自己的座右铭,而且经常去提醒自己的同伴。毕业后,正如他们一篇小说中写的,“五十年代培养的一代人,党给他们一种奇异的生命力,到哪儿就在哪儿扎根。”他们两个浙江青年一起到了内蒙边疆,长期在组织安排的教学和编辑岗位上勤恳工作。至今温小钰同志还在内蒙大学中文系执教,汪浙成同志解脱编辑工作也不久,这之前他热爱的写作一直放在了业余。

一九八〇年云南昆明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闭会之后,有人提议趁便去西双版纳参观访问,自愿前往的有七八位,其中有汪浙成同志。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没有想到他身材高大,体貌健壮,偶有内蒙土语乡音,如果事先不知道他的籍贯,我准把他当成蒙族同胞。此行,除了云南文联同志引路,其他都是我们自己分工动手。他一路上总是跑前忙后,扶人提携。有时同时手提肩扛几个人的东西,挤车出站,颇为吃力,但他依然面带笑容,洒脱矫健。当人们称赞感谢他的时候,他曾不无感慨地解嘲说:“君不见困难时期,我们内蒙、东北人哪个回去不是象驴一样驮?这是任重而道远的历史锻炼。”同行中,都是诗人作家,他自报内蒙《草原》杂志的编辑。他确实象编辑记者一样热心观察访问,每次听人介绍总是象好奇的小孩,引颈侧耳,手触口问。有一天远途步行参观归来,大家都已疲劳不堪,他听说一位同志要去探望一位早年的同学,这位同学大学毕业后就从内地来到这里“锻炼”,已与当地农村傣族姑娘结婚成家,扎根多

年。他听说以后，立即挺身而出，要求与他一起前往。后来他乘车时，衣袋被盗，他痛惜的不是别的，而是他参观访问的笔记本。他并不多言，而他的片言只语和点滴行动，却使我感到他身上有一股奔赴拥抱生活的热情和毅力。

后来又见到了温小钰同志。见面审视，除了她那开阔丰满的前额确实给人以突出的印象外，仪表并没有特别的地方，如果说有的话，就是比一般朴素的女同志更加朴素。原来“这小子”的称呼，完全是女友之间友谊的夸张。事先还听说她健谈，吕微芬说：“有她在座，就不用听别人的。”汪浙成也谐趣地说：“在家里，我们两个人的话都是让她一个人说了。”见面交谈确实觉得她开朗聪敏，但不象一般健谈者抢话夺声，口若悬河。当大家争题夺话的时候，她反倒沉静寡言。当话题集中到五十年代和当今一代青年人的对比时，她加入了进来，展开了论述，很快把大家吸引住了。从她的学生们谈到她自身，从事实描述到理论分析，雄辩而不逼人，而是深情倾诉又娓娓动听。说话时没有引人注意的手势动作，偶尔扶扶近视眼镜的鼻梁，拢一拢前额的覆发，如果留心观察，便会发现这时她的眼光凝聚，宽阔的前额更引人注意。一席谈话结束，吕微芬和汪浙成先发制人地说：“是不是大家都听她一个人的了？”原来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健谈。

我与他们的接触不过如此。如果说我们之间有点知交的话，还是他们作品的牵引。

熟悉我国六十年代文学创作情况的人，应该熟悉他们的名字和作品。我这个粗心的读者，虽然对他们并不完全

生疏，由于没有认真读过他们的作品，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他们的名字象“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闪现在眼前，那是我无意间读了他们的短篇小说《积蓄》之后。

《积蓄》也是描写我国当代中年知识分子命运的。作品描写的一对中年教师生活艰窘，工作劳累，事业追求，家庭烦恼，精细逼真，历历在目，堪与《人到中年》的描写媲美。这是我看到的最早一篇反映当代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命运的小说。这对中年夫妻一家日辘月铢，孩子克扣下夏天的冰棍钱，才有了一笔积蓄。计划购置一台黑白电视机，孩子可以在自己家看电视，不必挤到别人家忍辱受屈；家长也不必为此分心。但是，因为接待他们大学时代的同学——一位美籍华人，他们忍痛动用了这笔长年的积蓄，以免在外籍人面前显得寒伧，有失社会主义祖国的声誉。结果多年的希望变成泡影。作品描写的这对中年知识分子的艰窘处境固然令人心酸；而他们那片爱国赤诚，更让人肠热。

但是这篇作品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就被《人到中年》遮掩了。我欣赏《人到中年》，同时也为《积蓄》惋惜。就在上面提到的八〇年去西双版纳的中途，汽车小息，我们下车活动，我作为与汪浙成同志结识交谈的话题，把这个意见对他讲了。他当时没有说什么，只是微微一笑。到达目的地以后，晚上他找到我，详谈了他们创作这篇作品的旨意心情。可以听得出，小说中这对中年知识分子的形象中，有他们自身的影子。他解释说：“积蓄”是有寓意的：个人积蓄不多，国家也积蓄不多，再也不能折腾了！他们的一片创作苦

心未被注意，确实也心有不平。因此在默契中有了心交。这并不意外和奇怪。因为每篇呕心沥血之作，都是作者嚶嚶求友之声。哪个作者不希望得到自己的读者？有人转引普希金的话说：他为他的读者而活着。

一年后又读到他们的中篇小说《土壤》。我认为这是他们空前的力作，也是当时整个中篇创作中的一只硕果，就它的生活容量来说，可以算得上一部浓缩的长篇。趁他们来京的机会，在吕微芬同志家里，我访问了两位作者，并围绕着《土壤》作了一次长谈。正式交谈之前，汪浙成同志突然问我还记不记得一年前去西双版纳途中的那次谈话。我懂得他的意思，并不是在考验我的记忆。这使我们的交谈一开始就是推心置腹的。我说《土壤》里的魏大雄确实是过去作品中少见的成功形象。魏大雄是一个反面人物，不是叫人一眼看透，双重、多面、复杂。他深谙政治权术，但他是凭着实干成绩博得政治优势的。他城府很深，作风又洒脱大度。奉迎与干练合金般镕铸在这个形象上。复杂的形象产生于复杂的社会土壤，作品在这方面的描绘也具丰彩。但是作品的主要成就不止于此。另外辛启明和黎珍也是两个成功的艺术形象。而且这两个形象对读者心灵产生一种悲剧的震撼力量，寄托着作者生活与美学的理想。当时的评论文章只肯定了前者，对后者还未涉及，我就此提出了自己的读后感想，征询作者的意见。上面提到的温小钰同志那篇关于青春、时代、生活的侃侃陈辞、娓娓动听的谈话，就是由此引起的。还谈到《土壤》的手法方面。采取三个不同“我”

的第一人称，这是以前作品中没有的。这可以使不同的人物自陈心迹，又便于从不同人物的多角度展开生活，确有新颖之处。不过基本手法还是严谨的现实主义的。当时“现代派”、“意识流”已经引入，手法上的争奇成为时尚。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共鸣。他们风趣地说：在时髦的风气下，坚持一点现实主义传统也可谓是一种“创新”。这次谈话使我进一步获得了对他们的印象：他们不仅有一股奔赴拥抱生活的热情和毅力，而且在思想艺术上有冷静的主见和自信。这引起我重读他们过去作品的兴趣。读了他们过去的作品之后，又加深了这个印象。

《白云之歌》是他们最早的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在一九六四年第一期的《萌芽》上。同年十月号《人民文学》“新花集”转载，后来又被选入一九六四年“萌芽”短篇小说集和一九六五年出版的《青年作者短篇小说选》。这篇作品并不是他们最优秀的代表作，但却有代表性。作者在这里首次展开了内蒙沙漠地带奇异风光的描绘。不读这篇作品很难想象出沙漠上种种壮丽的奇景。“跳出地平线”的旭日，射出万道霞光，使晨雾颤动，把沙海妆扮成“用珍珠镶嵌的地毯”。沙漠地带又是“风的故乡”，突然之间风会从四面八方兴冲冲跑来，“一个个”象有个性的生物，奔跑追逐，纠缠打滚。无垠大漠，无际长空，又是如此空寂辽阔。地平线上行着驼队，驼峰上闪耀着人影。他们后来的作品，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地方的特色：《白沙杏的故事》、《喧闹的牛耳河》……。人物情节差不多都展开在内蒙独特自然风光的

背景上。即使写的是“钢城”也飘散着沙漠、草原的气息。《土壤》关于内蒙沙漠地带的描绘，不仅写出了外在风光的变幻莫测，而且写出了内在的变迁和生命。扎根在沙漠的矮小植物，深深筑窝，匆匆觅食在沙漠中的甲虫，写得多么富有生命力！关于深陷在沙漠下的枯木遗骸、涸谷遗迹的描写，令人醒目遐思，构成了《土壤》的一个重要特色。从《白云之歌》到《土壤》，可以看出作者长期不懈的迢迢行踪，在祖国这片疆土上，开垦了自己创作的自然领地。

作品的自然环境描写，应该是典型环境的一部分。鲁迅作品中的“鲁镇”、“未庄”，由于富有江南景色，而更具典型环境的特点。赵树理、周立波、柳青、孙犁等作品中的各具特色的典型环境，都是各在不同的自然环境怀抱中。沈从文的作品独具风格，这是有口皆碑的。而他作品的一个显明特色，就是湘西的自然风光。普希金甚至把地理条件作为民族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我们回想读过的那些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作品的时候，伴随着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社会生活风貌的深刻印象，同时呈现在眼前的是俄罗斯大地的风光。两者在我们头脑中构成俄罗斯文学民族特点的概貌。自然环境的再现不仅需要所谓“风景描写”的文笔，更需要对祖国某方风土的理解和热爱。

《小站》、《苏林大夫》、《妻子同志》、《琐屑的故事》相继发表在《白云之歌》之后，也是这两位作者创作处女期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应该怎样生活和愿意怎样生活”的矛盾，其中《苏林大夫》关于这个主题的揭示

最明确。作品一开始就是主人公苏林陷入这个矛盾的苦恼中：“应该怎样生活和愿意怎样生活。谁能把这二者统一起来，他就不会有这许多矛盾苦恼，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可是，我……”因为他大学毕业时，曾希望到草原上去繁殖改良马种，开展自己理想的事业；结果却被分配在他以为无所作为的林区小兽医站工作。后来他逐渐认识到这个岗位工作的重要意义，不知不觉中建立了感情，不但认识到这是“应该过的生活”，而且成为他“愿意过的了”，这时候，他才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充实和幸福”。《妻子同志》和《琐屑的故事》表面看来是写的夫妻和爱情，其实是同一主题的伸延和深入。丈夫不应该把妻子看成“我的老婆，而再不是同志”；妻子不应该是“只需要丈夫，而不需要其它的女人”；“妻子这个称呼，应该是爱人、姐妹、朋友、同志的总和”；但是这种新型的夫妻关系不能产生在家庭小圈子内，只能建立在共同的工作劳动上。从《妻子同志》中这对夫妻的爱情萌发和枯萎、家庭离析和重圆中，得到的教训与其说是如何处理夫妻关系，不如说是如何对待生活。《琐屑的故事》写的是三个女性不同的爱情遭遇。一个原来学的冶金专业，她本来应该到她有作为的工厂矿山去工作。可是婚后为了安乐的家庭生活，不得不牺牲了自己的专业。结果“没有了自己的生活”，“只是××的老婆”，不过三十岁年龄，已感到象老太婆一样苍老，惆怅。另一个也曾追随着丈夫，在生活的水面上飘来飘去过。当她觉悟到自己没有权利放弃自己的知识和理想，而且确实生活中扎下根以后，即使与丈夫分道扬

镰，也感到幸福。正如她自己说的：“只有把根子深深扎在劳动和建设的土壤里”，“才不会变成攀附在别人枝条上的柔藤”。这是一个坚强秀美，正跨在“生活分水岭”上的年青女主人公，从自己的受骗和两个不同的女伴经验中，不仅“结束了自己轻信的、盲目的爱情”，而且重新确定了自己奔赴的生活目标，不应该为某个“他”而来，应该为草原钢城的建设者而去。这里提出来的问题，仅仅是关于爱情的选择而不是生活的选择吗？汪浙成和温小钰后来的作品，虽然远非如此天真单纯，但依然可以看出其间的思想脉络。作者总是从不同的“生活分水岭”上观察生活和展开人物命运的描写。他们的正面人物，即使曾受到过所谓“应该怎样生活”的欺骗愚弄，也未失去应该怎样生活的信念，而陷入个人的打算，如辛启明、黎珍。即使生活有负于己，己也不应该负于生活，如《积蓄》中的两位中年人。对于浩劫中的受害青年，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但不同情他们破罐子破摔的生活态度，指给他们的是应该积极生活的道路。

生活的历史转折，给这两位作者的创作也带来了转折性的变化。过去长期蕴藏、积蓄，突然得到机遇喷吐焕发，创作了异峰突起的力作《土壤》。《土壤》的主要成就是刻画了比较深刻、复杂的人物形象。正是从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可以看出作家对社会透视的深度。过去他们的作品比较薄弱的一环就是缺少人物性格的刻画，创作的焦聚还没有完全对准在人物上，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开掘去开掘社会生活。因此作品内容都比较单纯。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过去的人

物突然都成长丰满起来。同时，使他们打开了新的创作眼界，另辟蹊径，写出了不同于《土壤》而别具一格的成功作品，如《苦夏》等。

总之，他们沿着自己的创作道路远远地走来，又向着新的创作目标坚定地走去。

以上不是序。只是我对他们的了解。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

目 录

我所了解的他们	朱 寨 1
---------------	-------

第 一 辑

别了，蒺藜	1
苦 夏	131
春夜，凝视的眼睛	197

第 二 辑

白沙杏的故事	267
积 蓄	283
错位的扣子	308
日落时，歌声不会西沉	329
宝 贝	354

第 三 辑

小 站	375
琐屑的故事	390
妻子同志	405

喧闹的牛耳河	422
苏林大夫	440
白云之歌	460

别了，蒺藜

……当代青年心田里都生长过蒺藜。但愿，
但愿没有人再播种荆棘……

——摘自手记

第 一 章

营营嗡嗡的人声，房间成了个大蜂巢，青年人涨红着脸，挤来挤去。“对不起”，“没关系”，“请……”，“谢谢”，“您好”，……人们忽然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文明得使人害臊，使人兴奋。是的，大学生了嘛，不由自主地变得文质彬彬，要有风度、懂礼貌、注意仪表。一张张录取通知单，叭，叭，挨个儿盖上红通通的印章。

“来，组织关系交到这里。”

“来，工资证明交到这里。粮食关系交到这里。”

“来，讲义费。”

“来，……”

教学部、组织部、膳食科、财务科、校医室、图书馆。“好，这儿手续清了，请去系里报到！”

谢冬坐在竖着团委牌子的桌子后边忙碌着，他是临时抓来帮忙的。今年的学生真有趣，大大小小，参差不齐，大同学几乎可以做小同学的家长。十年没有举行入学考试，十届中学生压在一起挤进大学的校门。十届学生，这是两代青年！长兄和幼弟，叔叔和侄儿，他们将坐在一个教室里，一模一样的小小课桌后边，从同一个起点出发，开始智力马拉松的比赛。当然，选上来的大多是优秀的，但真正优秀的却也并未全都入选。人太多了，后门还来不及堵死，积重难返，后门这条宽宽的缝还会存在几年。为了让已上“分数线”但成绩较差的“硬茬”上来，只有用各种口实和手法，把成绩更高的“软茬”打下去。谢冬同情那些年近三十的大青年，因为年岁大、已婚、视力弱、胃病、参加过造反组织，或者社会关系有斑点等等，都给对手提供了进行致命一击的绝好口实，竞争能力大大削弱了。“老三届”往往要败在小应届手里。就象谢冬在生产建设兵团时挑选山药种籽一样，个儿大的，发现有个斑点，就得扔掉，情愿留个儿小一点的。好在山药无知无觉，不会有意见。而人呢，人却会气恼，会委屈，会伤心；人有愿望，人有命运，人会哭泣。谢冬自己被打垮过，在扑面的风沙中疾走，愤怒地哭泣过。后来，他也把别人挤了下去。唉，一想起那件事就叫人难受。生存竞争的手法真残酷。不过这种残酷的法则一直继续到今天，以后还要继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今年，谢冬所在的数学系为了选拔一个学生，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系主任郑伊立教授和学校负责招生的教学部副部长老黄之间发生了激烈的